湘江头条

深重的乡谊：杨树达学术人生的湖南印痕

——纪念杨树达先生诞辰140周年

尧育飞

杨树达（1885年—1956年），字遇夫，号积微，晚号耐林翁。师从梁启超、叶德辉、胡元仪，1905年赴日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归国。曾供职于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清华学校、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学院等学校或机构，并于1950年11月被聘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后为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杨树达在语法学、修辞学、文字学、文献学、史学等领域取得很高的成就。著有《词诠》《高等国文法》《中国修辞学》《马氏文通刊误》《古书句读释例》《古书疑义举例续补》《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论语疏证》《汉代婚丧礼俗考》等。

《杨树达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 资料图

1937年8月2日，杨树达在日记中写道：“湖大送聘约来。”至此，这位远游北京将近20年的著名学者正式回归家乡，来到湖南大学任教。

时间上溯至40年前的1897年冬天，湖南大学前身之一的时务学堂创办，13岁的杨树达考取入学，成为学堂最年轻的学生。

从时务学堂最年轻学生，到湖南大学著名教授，这40年于杨树达而言好似一场远游。他从湖南走出，回到湖南，不仅是落叶归根，也源于他想把学问带回湖南。

故乡湖南，是理解杨树达学术人生的重要窗口。

时务少年好身手

1938年4月29日下午，杨树达没有课，索性游览岳麓山。

他穿过万寿寺、白鹤泉，游览了张辉瓒墓和蔡锷墓。当天日记写道：“张，留日时同学，蔡则时务同班生也。”人到中年的杨树达，面对英年早逝同学的墓地，难免生出万千感慨，日记中却不见沉重的叹息，只抄录湖南老诗人刘善泽赠予他和曾运乾的诗，诗作颈联云：“输君早定千秋业，老我初添两鬓华。”年华虽易逝，追求功业却始终是近代有志气的湖南人不变的目标。无论功过何如，蔡锷和张辉瓒都已留名史册。追慕朋辈盛业，杨树达难免生发立言不朽的焦虑。

历史证明，杨树达最终实现了立言不朽的宏业。这位时务学堂最年轻的学生，日后同样对同学构成“朋辈压力”。曾任湖南大学教授的钟佩箴，是杨树达时务学堂时期的同学，晚年曾对儿子钟叔河说：“人不可不立志。我碌碌无为，比同学少年，武如蔡艮寅（锷），文如范源濂，作学问如杨树达，搞政法如章世钊，都不啻云泥……汝当以我为戒。”钟佩箴痛自贬抑，意在激励儿子。然在老成的钟佩箴看来，杨树达已与时务学堂最杰出的学生蔡锷、范源濂、章士钊等人一道名垂后世了。早于钟佩箴，著名历史学家谢国桢在《清代书院制度变迁考》中论及时务学堂历史，同样声称著籍者若蔡锷、范源濂、杨树达，于事业、学术皆有所建树。

时务学堂，不仅为少年杨树达奠定了高远的人生目标，也为他打造了有力的人际网络。日后杨树达奔赴北京的教育部任教，是出自时务学堂的教育总长范源濂的援引。1927年12月，范源濂逝世，杨树达亲往天津范家吊唁，后赠以挽联云：“败而死有李君抚生，成而死有蔡君松坡，吾党信多才，非公谁与抗手；不令子为汉之孟博，而令子为宋之希文，造物岂无意，胡为今不假年。”杨树达视革命志士为“吾党”，与在时务学堂受乃师梁启超等人的影响不无关系。梁启超死后，杨树达撰公祭文，终生服膺梁氏之学。

时务学堂，还是陈寅恪与杨树达学术友谊的媒介。杨树达曾赠诗陈寅恪云：“朋交独畏陈夫子，万卷罗胸不肯忘。一别五年萦梦寐，辱知三世岂寻常。”所谓“辱知三世”，说的是陈寅恪祖父陈宝箴甄选时务学堂诸生时，杨树达与乃兄杨树穀联袂与选，而校阅文字的又是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

对时务学堂之种种，杨树达不免怀着深情，特别留心。他读石醉六《六十年的我》，认为：“卷中记徐仁铸、介石及蔡锷入时务学堂，又言谭嗣同为学堂学监，语皆不实。蔡以陈右铭中丞之考试，与余兄弟同入堂，时在光绪二十三年丁酉冬间，徐尚未来湘也。谭为时务创办人之一，何至为学监耶？”邵阳人刘达武编蔡锷年谱，记蔡锷在时务学堂事迹不确，杨树达也要贻书指正。1932年12月12日日记记载刘善泽住在泰豫旅馆，杨树达特别注明“时务学堂故址也”。1933年1月7日，时务学堂同学恳亲会在长沙大吉祥旅社举行，杨树达与同学周季凡等倡议为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题字刻石。可以说，时务学堂，奠定了杨树达学问与人生的气象，而杨树达对时务学堂也莫之或忘。

绍述湘学实证一脉

尽管爱得深沉，但对时务学堂诸公，杨树达未必没有微词。如对熊希龄，杨树达1934年5月19日日记云：“此公少年时办时务学堂，余时年十二三，见其举止不庄凝，心乃疑其不寿，今亦竟过六十。然身居高位，绝无遗爱在人，感其德者，皆琐琐姻娅。湖湘老辈奖学好士之风，于此公身体中殆不能发现一骨毛，宜吾湘人才之不振也。”杨树达之不满于熊希龄，乃在熊希龄身居高位，不无偏私，没有发扬湖南老辈提携后进的优良传统。

《杨树达日记》，浙江古籍出版社。 资料图

在杨树达自身，实在深受湖南老辈的教诲与厚爱。恩师叶德辉逝世后，杨树达两次作《哭郎园诗》凭吊，其一云：“爱才若命由天性，说项逢人信古风。记得后堂丝竹日，通儒座上有成童。”此诗杨树达自注说，叶德辉父亲六十大寿时，叶德辉执小门生礼请王先谦上座，又请王先谦的熟人作陪，意思不仅在尊师，还有意将十六七岁的杨树达引荐给王先谦，陪侍诸老。师门三代，此日融融。杨树达感慨道：“余生平两见葵翁，此为第一次。稍长，颇能读葵翁书，其因缘实始以此。”1914年，王先谦居长沙凉塘乡，杨树达亲往拜谒，见王先谦“犹孳孳著述不少懈”，不禁叹服“前辈好学之勤”。

少年时期受到叶德辉等老辈的提携和教导之恩，杨树达铭感终身。1928年8月6日，距叶德辉遇难一年零四个月后，杨树达回到长沙老家，听闻叶德辉儿子叶启倬述说叶德辉遇难经过，杨树达为之郁抑难安。1928年8月10日，杨树达“到郎园师家拜师灵”。此后，杨树达一旦读到叶德辉的诗作，早年的温情回忆便不自觉涌上心头。如1944年2月13日日记载：“晨翻阅郎园师《诗文钞》，《还吴集·怀人诗》中先后二首及余，其中绝句一首注言余息交游，终日阒然。余少壮时痴憨之状如此，亦可笑也。”

对湖南人，杨树达怀有深情，但对湖南人的某些作派，未必许可。杨树达1939年5月21日日记回忆钱玄同所言云：“君治学语必有证，不如湖南前辈之所为。而做人则完全湖南风度也。邵西做人脱尽湖南气，而为文字喜作大言，全是湖南派头也。”可见，杨树达以做骨鲠的湖南人而骄傲，对肆意放言的湖南治学风格则不以为然。

杨树达试图重塑实证的湖南学脉，其1944年6月1日日记云：“太炎先生尝云：‘三王不通小学。’谓介甫、船山、湘绮也。三人中湘士居其二。余昔在北京，曾与星笠谈及此，余谓此时吾辈二人皆游于外，他日仍当归里教授，培植乡里后进，雪太炎所言之耻。星亦谓然。”因为章太炎说王夫之、王闿运都不通“小学”，杨树达深以为耻，故与好友曾运乾（星笠）慨然发愿专力于传统“小学”研究，期以为湖南雪耻。

晚年杨树达曾有诗云：“生平耽述作，幸不谬通人。”自注云：“先辈如梁任公、章太炎二先生，并世闻人如张君孟劬、陈君寅恪、胡君适之、郭君鼎堂，于余所著书皆有过奖之词，虽西方人治汉学者，如瑞典之高本汉君、苏俄之阿利克君亦然，至好如余季豫、曾星笠二君，又阿好不待论矣。”后杨树达在民国时期荣膺“部聘教授”、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担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可说在学术上为湖南人争得荣誉，也达成了早先与曾运乾为湘学雪耻的誓言。

稍传所学于乡里

在1937年8月2日湖南大学聘书送达之前，杨树达已与湖南大学结下不解之缘。

1932年12月20日，杨树达在湖南大学演讲《说文形声字声类有假借之说》，“诸生颇为动容”，时在台下听讲的曾国荃玄孙女曾宪楷对此印象颇深。两年后，已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曾宪楷在火车上偶遇杨树达，一见即识。此期北方局势不宁，湖大窥得消息，已有邀请杨树达担任教授之议。1933年1月17日，时任湖南大学教授的骆鸿凯便对杨树达表达了“如因北方事不往清华，则湖大当请讲授”，而杨树达在考虑之后，最终并未答应。

湖南人对杨树达的学问终是敬佩，请他回湘教书的热情始终不减。1936年底，湖南大学的学生就要求黄士衡校长礼聘杨树达、周鲠生、皮宗石三人为湖大教授。不久，皮宗石回到湖南大学担任校长。时值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杨树达回到长沙，曹典球等湘中耆宿再度邀请杨树达到湖南大学任教。起初杨树达担心和时任湖南大学校长的皮宗石心存芥蒂，未敢应允。后经曹典球等人斡旋，告知皮宗石已无成见。杨树达因此颇为心动，5月21日日记载：“家居讲学，一可以奉衰亲，二可以传所学，亦未为不可，但不知清华能允与否耳。”不久之后，皮宗石亲来走访，请杨树达留湘任教。杨树达遂下定决心，到湖南大学任教。这年八月，挚友曾运乾也接到湖南大学聘书，两人从此开始在湖南培植乡里后进的教学生涯。

彼时的杨树达肯定不能逆料，他后半生的教育事业将永久定格于湖南。尽管其间不无波折，如1938年7月17日日记载：“佩弦来书，邀余返清华服务，聘书不日寄来。余去岁到湖大固缘亲病，亦因倦游，欲在里中稍传所学于乡里后进，然而时局日紧，九江、南昌危在旦夕，又生平积蓄尽在新居，一旦停职，则将成饿莩。欲往则违宿志，欲留则危险实多，此中忐忑不宁，真无可如何也。”1938年的湖南，局势危急，朱自清来信邀请杨树达重回清华大学任教。杨树达对此颇感踌躇：去昆明的清华大学任教则违背了“稍传所学于乡里后进”的志愿，但留在湖南，则面临生存的危险。几番思量，杨树达毅然决定留在湖南。

抗战期间，迁至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也屡屡来书礼聘杨树达，但杨树达并未答应。及至抗战结束后，武汉大学再度来请，杨树达1945年9月17日日记云：“今战局已解，而余欲离湖大，心又有不能恝然者，以与余归教乡里子弟之意相反也。若至武大，则湘生往游甚便，故余今复书，谓可去，但不必勉强耳。”后因与武大教务长皮宗石关系不睦，杨树达最终并未前往。

通观杨树达日记，可见“教乡里子弟之意”始终萦绕杨树达心间。可以推想：若非这深重的乡谊，杨树达恐难终老湖南。

“湘人”的身份意识

前些年，美国历史学家裴士锋（Stephen R. Platt）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阐明湖南人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引领作用。而早在90年前的1935年7月14日，杨树达演讲《清代湖南文化史略》，已推阐这一历史现象的文化根由。杨树达那次演讲的主旨为：“一论乾嘉间汉学，湘人未大受影响；二论外患之影响，湘人感觉最敏，故考求洋务以湘人为最先，魏、郭、曾氏父子；三论湘人讲宋学兼讲经济，体用并进，故洪杨之役，戡定必假手于湘人。”杨树达此论可谓高屋建瓴。

杨树达对湖南的文化传统有相当的关切。他关心《全唐诗》中收录若干湖南人，也为《续修四库全书提要》撰写湘人文集提要。在翻阅王重民所编《清文集篇目索引》，杨树达随即拈出其中所收湘人文集24家。文学研究非杨树达本行，但湘人的文学成绩，他时时留意。

事实上，湘人是杨树达惯常使用的词语和身份标签。新结识的人如系湖南籍，日记便要冠以“湘人”二字。对优秀的湖南人，他往往以“吾湘”表达亲昵之情。若行为不轨者是湖南人，杨树达便痛骂其人为“湘人之耻”。

杨树达以湘人自居，对湘人在全国文化版图中占据重要位置也有特别的追求。如1943年教育部颁发第二届部聘教授时，杨树达12月17日日记记载法律方面戴修瓒当选，经济学方面刘秉麟入选，遂感叹：“湘籍占二人：戴、刘秉麟。去年部聘，法律胡元义、经济杨端六皆湘籍，今年又然。此二科四部聘皆湘人矣。”他由衷地为湖南学人取得的成就而自豪。

然而对于湖南学术之不足，杨树达也不吝批评。1947年10月18日日记载：“阅报，载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推举院士候选人百五十人，余与季豫皆在其列，湘人凡十人余及季豫外，为金岳霖、李剑农、蒋廷黻、何廉、周鲠生、杨端六、张孝骞、曾昭抡，人文组八人，生物、数理二组各一人，湘人对于物质科学不努力可以概见，殊可叹也。”当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结果公布后，杨树达不仅关心自己当选，更留意湖南人所占的比例。1948年10月1日日记载：“录院士籍贯表……湘六人中，人文组占四人，数理、生物二组各止一人，湘省科学家之落后亦可见矣。”杨树达没有满足于湖南人在人文领域取得的成就，而热望于湖南人在科学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从各方面而言，杨树达的学问不局限于湖南一隅，他并非地方性学者，而是全国闻名的大学者，但他学术成绩的定位，放在湖南文脉传统中独树一帜，有其特别的价值。陈寅恪序杨树达《小学金石论丛续稿》称：“百年来湖湘人士多以功名自见于世，而先生设教三十年，寂寞勤苦，著书高数尺，为海内外学术之林所传诵，不假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论世知人，此可谓允当其实。

学界的杨树达，有其不可磨灭的永久价值；湖南的杨树达，有其始终常新的地域价值。谨以此文，纪念杨树达先生诞辰140周年。

（作者系湖南大学中国古代非虚构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湘江观潮
湖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

现实题材如何深耕人民土壤

夏义生

近日，聚焦乡村振兴与文化传承的电视剧《乌蒙深处》正在央视热播。该剧根据湘籍作家欧阳黔森的作品《莫道君行早》改编，作品书写了武陵山腹地贵州山村脱贫攻坚对社会生活及人民精神面貌的改变。近年来，我国现实题材文学作品《雪山大地》《宝水》等获得了茅盾文学奖，受到了广泛关注。这说明了现实题材文艺创作仍然是时代热点，丰富了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当前，现实题材文艺创作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题材上跟风扎堆，人物脸谱化、标签化；缺乏感染力，人物、故事难以引发共情等等。究其原因，深层次的症结仍然是深耕人民土壤不够。要实现深耕人民土壤、扎根人民之中，我认为要重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深入生活，做到“身入、心入、情入”。“深入生活”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又是文艺创作的一条铁律，是“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我曾经当面问过王蒙先生，在他被划为右派之前，作品写的都是知识分子，而当时的文艺界正在反复强调写工农兵，为什么不去写呢？王蒙先生回答我，我那时对工农兵的生活不熟悉，他们说话的方式、过日子的习惯、待人接物的观念我都不熟悉，无法写。

王蒙先生的回答说明了深入生活、熟悉生活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为了创作《山乡巨变》，湖南省文联老主席周立波将家从长沙搬到益阳清溪村，一共在那里住了7年。韩少功在汨罗市三江镇八景村住了25年了，他在那里耕菜地，调解村民纠纷，参加村里的红白喜事，被村民亲切称为“韩爹”。我们从他创作的《山南水北》《日夜书》中可以读到他在八景村满是烟火气息的日子和知青记忆。

不容忽视的是，当下在深入生活方面也还存在走马观花、道听途说的现象，创作的作品难以“走心”。这些年，省文联也想了一些办法，比如选派文艺工作者参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在乡村社会的大变革中积累素材、发现主题、寻找灵感。

二是与人民同行，做到“平视、共情、成长”。“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推动新时代文艺繁荣发展，须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在与人民同行中做到“平视”，聚焦当代社会发展中的看病就医、升学就业、住房社保、生态环境等事关千家万户的社会矛盾，聚焦普通劳动者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

网络化、数智化和新技术的兴起，削平了文艺创作和传播的门槛，新大众文艺方兴未艾。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黎扬全认为，在这个新的文艺场中，依靠大数据、算法与算力，特别是新媒介与商业的结合，流量至上的商业逻辑，导致迎合大众欲望的低俗化、同质化、甜宠化现象蔓延，是值得警惕的。由此可见，新大众文艺与人民文艺之间不能简单地画等号，人民文艺要大众化，人民文艺还要化大众。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文艺应该与人民共成长。

三是为时代画像，做到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筋骨是作品的脊梁与风骨，源自人民生活土壤的作品应该展现新时代昂扬向上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展现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的精神风貌；道德是作品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导向，体现时代精神价值的作品应该秉持崇高的理想追求，引导人们向上向善；温度是作品的人文关怀与情感连接，有温度的作品“鼓舞人们在黑暗面前不气馁、在困难面前不低头，用理性之光、正义之光、善良之光照亮生活”。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是现实题材文艺创作的人间正道，这条康庄大道指向两大目标，一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二是增强人民的精神力量，二者同等重要。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电视剧《乌蒙深处》剧照。 资料图